

蒙古史研究之二

关于北元宣光年号的考証

方 齡 貴

昆明师范学院历史系

一九七九年七月·昆明

提 要

北元宣光年号开始于哪一年，历时几年，从来有不同说法。本文据汉文著录、蒙文史料和新发现的有宣光纪年的碑文等等，对宣光年号重新作了考证，认为《新元史》以宣光纪元系于洪武四年（公元1271年）及以宣光纪年为八年（1271——1278年）是正确的。文中附带考证了天元年号，结论也和《新元史》一致，认为天元纪年始于洪武十二年（公元1379年），历时十年（1379——1388年）。

关于北元宣光年号的考证

方 龄 贵

读罗福颐先生《北元官印考》①一文，得知宣光元年太尉印重显于世，另外还发现宣光五年和天元五年两方官印，给研究北元的历史增加了新的资料，非常可贵。罗先生文中涉及对宣光年号的考证，现在就这一方面说一点意见。

宣光是元顺帝妥懽帖睦尔的儿子爱猷识理达腊(即元昭宗)在塞北即位用的年号，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。②所当考的一是宣光纪元始于何年，二是宣光年号用了几年。关于第一个问题，历来有两种意见，即洪武三年(公元1370年)说和洪武四年(公元1371年)说；关于第二个问题，有八年说，九年说，十一年说。兹试为考证如下：

说宣光纪元始于洪武三年，较早的有清代的叶维庚，他在所撰《纪元通考》卷一《历代正统年号》元昭宗条说：“讳爱猷识理达腊，顺帝太子，洪武三年庚戌即位应昌，改元宣光，是为北元。”下面还记纪元始年：“宣光、庚戌”。此后缪荃孙在《元昭宗年号宣光考》中也说：“(元)昭宗立于洪武三年庚戌，此碑立于宣光八年即洪武十年丁巳(公元1377年)也”。近年出版的《中外历史年表》于1370年·庚戌·明洪武三年下记云：“四月……元顺帝死于应昌，子爱猷识理达腊嗣，是为昭宗，改元宣光”。③又《中国历史年代简表》年号通检“宣光”条云：“北元爱猷识理达腊，1370—1377”。④都以1370年即洪武三年为宣光元年。说宣光纪元始于洪武四年，已见李兆洛《历代纪元编》，该书卷一《总裁》附《元裔》条：“昭宗、宣光，洪武四年”。此后通常为人所知的是柯劭忞的《新元史》。按新史卷二十六《惠宗纪》四附著昭宗皇帝事，记为“宣光元年，明太祖洪武四年也”。晚近《新纂云南通志》转载胡光燾、方国瑜两氏的考证，并持此说。⑤

今案洪武四年说是也。欲考查此一问题，应注意三方面资料，一是汉文著述，二是蒙文史料，三是有关碑刻，合三者而考之，是不难得其正鹄的。汉文著述中，《明史》、《明实

① 见《故宫博物院院刊》1979年第一期。

② 王昶不知北元有宣光年号，曾经认为“(云南)通志寺观卷‘兴宝寺，在姚州城西十五里；元宣光间建’。元无宣光之号，其误显然。据碑则寺为大蒙建极年知军事布燮杨楨之所创，盖建于蒙氏时矣。建极之元建于唐宣宗大中十三年，则元宣光者或是唐宣宗之讹”。(见所撰《金石粹编》卷一六〇《大理国上功高踰城光再建并栋华府阳派郡兴宝寺德化铭并序》所加跋识)这已经缪荃孙在《艺风堂文集》卷三《元昭宗年号宣光考》中给以驳正了。

③ 见齐思和、刘启戈、聂崇岐、翦伯赞编著《中外历史年表》，三联书店1958年9月第一版本第541页。

④ 见文物出版社《中国历史年代简表》，1973年12月第一版本第237页。

⑤ 见《新纂云南通志》卷九四《金石考》十四元《文殊奴神识经幢》跋。

录》本来是最重要的，但于“宣光”年号不著一字，《南诏野史》及丁鹤年、王逢诗中均道及宣光纪元，①而未确言始于何年。蒙文史料中，最易得的为汉译而出的《蒙古源流》、《蒙古世系谱》、《蒙古青史》诸书和未经汉译的《黄金史》。②至于碑刻，其有宣光年号的，已著录者除见于朝鲜方面外，以云南为多。顺帝北行，云南一隅，在梁王把匝剌瓦尔密统治下，犹奉大元正朔，行北元年号，直到洪武十四年（公元1381年）明兵入云南，次年（洪武十五年，公元1382年）梁王自縊死，③云南诸郡次第平，中国复归一统。在这以前的十余年，云南继续用至元、宣光年号，屡见碑刻，④除经前人著录外，近年来更不断有所发现。其中经目验的有世人早已知道的《重建阳派兴宝寺续置常住记》，⑤《文殊奴神识经幢》，⑥以及最近新发现的《大光明寺住持瑞巖长老智照灵塔铭并序》碑⑦和《李成定神道》碑。⑧这些，都是研究宣光纪年不可或缺的资料。前人如柯劭忞似乎是最早注意到这三方面资料的。《新元史考证》卷十《惠宗四》所录史料来源有旧《元史》、《明实录》、《东国通鑑》、《高丽史》、《北巡私记》⑨等。又据《考证》知《蒙古源流》也是柯氏撰写《新元史》时屡尝征引之书，关于宣光年号的考订，不可能不翻检及之。案徐世昌《新元史序》，柯氏为著书曾经“博访通人，假其藏书，多四库未收之秘籍；旁及元碑拓本，又得三千余事”。这三千多种元碑，惜未见存目，不知内容如何，估计以宣光纪年的《重建阳派兴宝寺续置常住记》碑所当不遗，而朝鲜有宣光之号的碑文也不会见不到的。《新元史》以宣光元年当洪武四年，应非偶然。

其实，宣光建元之年，《高丽史》所载甚明。查《高丽史》卷一三三《辛禡传》载：“（辛禡）三年……二月……北元遣豆个达来祭敬孝大王，始行北元宣光年号”，又卷一二五《池溍传》载：“溍与李仁任、林坚味专权贪黷，……时（金）承得、（金）允升、判典校等事李悦、左常侍华之元党附（池）溍以希迁擢，自谓池门四杰。仁任欲剪溍党，未得间，会之元、承得聚悦家，言曰：‘厚待元使，不用洪武年号而行宣光七年，无乃速乎？’仁任廉得之，逐下悦、之元、承得巡卫府”。所记当为一事。按辛禡即位于洪武七年，明年洪武八年即1375为辛禡元年，其三年当洪武十年即1377年，为北元宣光七年。⑩逆推之，则宣光元年当是洪武四年即1371年。

① 丁鹤年诗和王逢诗业经缪荃孙《元昭宗年号宣光考》摘引。

② 这几种蒙文史料相互之间的关系，这里不遑细说。

③ 或谓梁王投水死，此据《明太祖实录》卷一四〇，《实录》系梁王之死于洪武十四年十二月壬申，当公元1282年1月6日。

④ 见前举方国瑜《文殊奴神识经幢跋》。

⑤ 碑现存云南省姚安县文化馆。

⑥ 碑原存云南大学，现在云南省博物馆。

⑦ 碑现存云南省大理县文化馆。

⑧ 碑为火葬罐墓盖，现存云南省禄丰县文化馆。

⑨ 《北巡私记》，刘侗撰，系柯劭忞得自独山莫氏之书，收入《芸窗丛刻》。北京大学研究院文史部排印的柯劭忞先生遗著第二种《新元史考证》第四叶作“张信北巡私记”，误。

⑩ 参考《高丽史》卷八七《年表二》“丁巳大明洪武十年”条。

蒙文史料不记宣光年号，但载有爱猷识理达腊继位年分。《蒙古源流》卷五：“阿裕锡哩达喇汗（按即爱猷识理达腊）戊寅年生，岁次辛亥，年三十四岁即位，在位八年，岁次戊午，年四十一岁歿。”辛亥当洪武四年，即1271年，也应当就是宣光元年。戊午当洪武十三年，即1278年，在位八年，即以宣光纪元八年，合。《蒙古青史》载：“铁木儿的儿子别灵图（按即爱猷识理达腊），庚申年生，三十四岁辛亥年即可汗位，为汗八年，至四十一岁戊午年崩”。①这里以庚申为爱猷识理达腊生年，与三十四岁辛亥即位之说不能相合，当从《源流》，其余与《源流》同。但《蒙古世系谱》与《黄金史》所记微异。《蒙古世系谱》载：“蒙古必力克图汗，（按即爱猷识理达腊）汗为拖欢忒睦尔乌哈图汗（按即顺帝妥懽帖睦尔）之子，嗣父位，抚有众蒙古部落居之，在位九年崩”。不言即位之年，惟云在位九年。《黄金史》作：“妥懽帖睦尔之子必力克图汗卒于同年（按指妥懽帖睦尔殁年）即狗儿年，在名为应昌之都城即大位，迄马儿年崩”。②此狗儿年即庚戌洪武三年，公元1370年，马儿年即戊午洪武十一年，公元1378年。据知洪武三年即位说与在位九年说，和《高丽史》及《蒙古源流》、《蒙古青史》等的四年即位说与在位八年说实在并无矛盾，盖爱猷识理达腊即位于妥懽帖睦尔死年即洪武三年，踰年改元，洪武四年即宣光元年。宣光纪元共八年，若连即位之年计之，是也可说在位九年的。

征以元碑，更足以证成此说。日本《大正新修大藏经》所收朝鲜李穡撰《西天纳薄陀尊者浮图铭并序》碑未署“宣光八年戊午五月日立”，③姚安《重修阳派兴宝寺续置常住记》碑未署“大元宣光元年丙辰孟秋上旬吉日”，新发现的大理《大光明寺住持瑞巖長老智照灵塔铭并序》碑未署“大元宣光九年龙集己未三月清明”，又禄丰《李成定神道》碑署为“大元宣光九年岁次己未十二月十一日”。据以逆推，宣光元年均当辛亥洪武四年，这是宣光纪元始于洪武四年的有力证明。

从上文还可看出，宣光年号实际共用了八年。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一点，还可以附带考证一下天元的纪元。天元是爱猷识理达腊的弟弟脱古思帖木儿所用的年号，据《高丽史》卷一三四《辛禡传》二“(辛禡)五年……六月……癸未太白昼见，北元遣金院甫非告郊祀改元天元”。按辛禡五年当洪武十二年即公元1379年，也就是天元元年，然则宣光年号的下限只能是洪武十一年公元1378年，宣光年号只有八年。蒙文史料不著天元年号，但多记录了脱古思帖木儿即位之年和在位年数。《蒙古源流》载：阿裕锡哩达腊汗死后，“弟特古斯特穆尔汗（按即脱古思帖木儿）壬午年生，岁次己未（按当洪武十二年，公元1379年）年三十八岁即位，在位十年，岁次戊辰（按当洪武二十一年，公元1388年）年四十七岁歿”。《蒙古青史》载：“鄂斯嘎拉台吉（《蒙古世系谱》作乌萨哈尔汗，按即脱古思帖木儿）壬午年生，三十八岁己未年即可汗位，为汗十年，四十七岁戊辰年崩。”④《黄金史》作：“同年马儿年，（按即戊午洪武十一年，公元1378年）乌萨哈尔汗卒即大

① 见谢再善译述《蒙古青史》排印本第16页。

② 见哈佛燕京学社印行乌兰托巴本《黄金史》，1952年版第二卷第127页第4至第6行，译文参考包登校注本《黄金史》第157页，小林高四郎译注本《蒙古黄金史》第93页。

③ 见日本《大正新修大藏经》第五十一卷《史传部》三第二〇八九号。

④ 见《蒙古青史》第16页。

位。经十一年，龙儿年（按即戊辰洪武二十一年，公元1388年）崩”①这表明脱古思帖木儿于戊午洪武十一年即位，踰年改元，天元元年当乙未洪武十二年，公元1379，死于戊辰洪武二十一年，公元1388年。天元年号一共用了十年。

所以有理由说，《新元史》载昭宗即爱猷识理达腊于洪武四年建元宣光，在位八年，以及脱古思帖木儿于洪武十二年建元天元，在位十年，②是有根据的，可信的。《蒙古世系谱》卷三按语中所说“必立克图汗以明年辛亥为元年，在位九年”及“乌萨哈尔汗以庚申年立是为洪武十三年，在位十年”云云，③未及细考，显然有误。查《蒙古世系谱》本文谓必力克图汗在位九年，如上文所考，系包括宣光八年戊午洪武十一年即位后未改元的几个月在内。踰年改元，宣光年号实行了八年。按语误解其文，竟以为宣光有九个年头，并把脱古思帖木儿即位的年分任意错后一年，定为庚申洪武十三年即公元1380年了，这都是不对的，至于《历代建元考》把宣光纪元定为十一年④，更不明何本，窃意不足取。

这里，还有一个问题，宣光年号只有八年，为什么在云南新发现了两块署有宣光九年的碑刻？这并不难解释。塞北天南，相距万里，消息隔绝，遣使为难，《南诏野史》载：洪武中吴云奉使云南时，“会梁王（把匝剌瓦尔密）遣铁知院等二十人使沙漠，为（明）边将所获”，则当时南北音讯不通之状可想。必其时爱猷识理达腊已死，脱古思帖木儿已即位改元天元，而云南还不知道，仍以宣光纪年，此理中或有之事，前人已论及之。第不止此。据1956年在凤仪县（现属大理县）北汤天法藏寺新发现的所藏经卷，其中元刻的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中，内七册卷末有宣光年间董贤墨写的造经记，年月分别为：“宣光上彰 涪滩之岁辛巳月上弦日”，“宣光十年季春十六日”，“宣光十年季春望日”；“宣光上章 涪滩之年执徐月既望日”，“宣光上章 涪滩之岁徐月既望日”（二册），“宣光庚申重光大荒月上弦日”⑤。上彰涪滩即庚申，也就是洪武十三年，公元1380年，其时已是北元天元二年，而云南还以宣光十年来纪年，理由当也不出以上所说。宣光十年，这大概是我们所能见到的最晚的宣光纪年了。

附带说一点。云南有没有以天元纪年的碑刻呢？应当说还是有的。康熙《石屏州志》卷十三《志补》有如下一条记事：“宝秀巡检张文光鈔录碑文一帙，多荒谬崇佛，不可存。内重修圣安寺塔塔碑载元事，一宣光五年旃蒙单阏，乙卯也。一碑记天元三年着雍启辟，戊午也。考《元史》并无宣光、天元年号，元太祖及世祖承宋统，至顺帝计十六，至一百六十五年，仁宗王子九年，皇庆二，延祐七，则乙卯宜是延祐二年，戊午宜是延祐五年，顺帝癸酉

① 见前举乌兰巴托本《黄金史》第二卷第127页第6至第7行，译文参考包登校注本《黄金史》第157页，小林高四郎译注本《蒙古黄金史》第93页。

② 见《新元史》卷二十六《惠宗纪》四，又卷二十七《宗室世系表》中的《惠宗以后世表》。

③ 现在见到的《蒙古世系谱》是据乾隆间蒙古学者博明西斋的旧鈔本排印的，按语是否西斋所加，待考。

④ 见钟渊映《历代建元考》历代建元类考下平声一先“宣光”条，又元·奇渥温氏“昭宗皇帝爱猷识理达腊”条。

⑤ 这些经卷，现藏云南省图书馆。参见周泳先《凤仪县北汤天南诏大理国以来古本经卷整理记》，收入云南人民出版社《大理白族自治州历史文物调查资料》一书。又云南省图书馆收藏的元刻《金光明经》（也是在北汤天法藏寺发现的）中，还有“宣光六年菊月十三日”李文通题写的造经记。

三十六年，元统二，至元六，至正二十八。明洪武元年戊申，则乙卯当是洪武八年、戊午当是洪武十一年。考明史洪武十四年始命颖川侯傅友德征云南，则宣光、天元，岂順帝既北之后，明师未入之先，或梁王虚拥正朔耶？”①按以宣光为梁王据地自雄所用的年号，倪蜕的《滇云历年传》也有此说，②现已不足辩。可注意的是宣光、天元两个纪年。宣光五年即乙卯洪武八年、公元1375年，与宣光建元于洪武四年之说合。天元三年戊午说则滋人疑惑。考天元前后的两个戊午，诚如《州志》所说，一为延祐五年，公元1318年，一为明洪武十一年，公元1378年，把天元三年系于1318年固不可能，系于1378年也多所抵牾。因为洪武十一年乃是宣光八年，时尚未用天元年号，更何从而来的三年？如这一年是天元三年，则天元建元之年应是洪武九年即1376年亦即宣光六年，那就是说宣光建元只有五年了，这在各方面都是讲不通的。现在天元三年的碑和张文光的书大概很不容易见到了，颇疑《州志》纂者对天元三年的碑文可能是录错了，三年之下的着雍敦（我所见到的抄本《州志》误作“启”，见上）解即戊午非指年分而指月分，如前举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中卷末董贤造经题记之例。是此碑即系立于天元三年辛酉，当洪武十四年，公元1381年，亦即明师入滇之年，然则这一纪年之难得也就于此可见了。

一九七九年七月十一日·昆明

① 此条承周泳先先生检出见示。

② 倪蜕《滇云历年传》卷五。